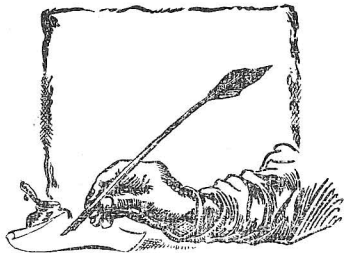


我 在 武 漢

阮 毅 成



(壹)

民國二十七年元月至七月，我三十四歲，在武漢。

我於是年元月二十日，自浙江金華乘浙贛路火車西行。因沿途軍運忙碌，行車乃無一定時刻。隨行隨止，隨止隨行。次晚到達江西省省會南昌車站，停了一夜，天明方始繼續開駛。二十三日下午四時，到達湖南省的株州，這是浙贛路的終點。從江西省的萍鄉到湖南省的株州，原有株萍鐵路。浙贛鐵路興建之後，乃在萍鄉接軌。我在車上四天三夜，幸而未曾遇到空襲警報。沿途最困難的，是獲得食物。只能在火車停下時，從月台上小販的手中，臨時購置零食充饑。既無定時，也無定量。從大餅油條直到麻花清粥，不下三十種之多。只有在江西省的鷹潭車站上，買到過兩碗白米飯。想

到韓信對漂母的一飯之恩，只有捱過饑餓的人，才知道這一飯的可貴。車廂中盡是傷兵與難民，車頂上也蹲滿了人。寒風侵襲，固不待言。而每過鐵橋，必須橫臥，以免觸及橋頂，被摔下車來。車內車外，人人皆受盡了流離之苦，發出了呻吟之聲。但是爲了神聖的全民抗戰，却並無一人口出怨言，說是不應該打仗。

我從未到過株州，下了火車，茫然無所之。我知道這是浙贛與粵漢兩路的交會點；如果有車從南駛來，我就上車先到長沙，再去武漢。如果無車，便只好覓一旅館，住下來再說。戰時行旅，皆是如此。我向站長室打聽是否有車北行，無人可以作肯定的回答。月台上擠滿了等車的人，皆已養成了耐性，在癡癡的等待。我等到天黑，忽然月台上起了一陣騷動，說是有車來了，而且是特別快車。我趕快買了去長沙的車票，居然擠上了來車，獲得了座位。湖南在當時算是後方，行車尚有秩序。十一點，到了長沙車站。我是第一次到，又在半夜，只能自己雇一輛人力車，去找旅館。長沙的人力車伕，是踏着方步，慢慢

行走，坐車的人不能性急。我連問了幾家，皆已客滿。最後找到了一家，稱做九州旅社。居然在頂樓尚有一小間，已屬難得。即將行李移入，安然住下。我已幾晚未曾安眠，此時第一件大事，便是先睡一個好覺。

次晨醒來，自覺天尚未明，而茶房已兩次來敲門，請吃早飯。原來已是上午九點，因室小無窗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而長沙的旅館，照例供給三餐，早上也吃乾飯，大魚大肉，與午晚餐同樣豐富。我的房飯金合計，每天只大洋一元二角。據說因爲京滬失守，逃難來的人多，已經漲了價，平時更要便宜。

我起身之後，吃了早餐。雖則已經幾天沒有好好地進食，但我要我在長途跋涉之後，一早就吃大葷，也不易入口。我先到又一村湖南省民政廳去看廳長胡次威兄。他是去年十二月，湖南省政府改組時，與新任主席張文白（治中）同時到任的。至於他原任縣長的江寧自治實驗縣，因爲南京淪陷，乃就自然取消了。次威兄對我說了許多有關張文白的治湘兩大方案，並且說：中央政治

學校的四年級學生，均已留在長沙，為湖南省政府擔任戰時民衆組訓工作。去年暑假，因抗戰方起，未曾招收新生。現在遷到芷江的，只有二年級與三年級學生。以法律系言，兩班共只有學生十一人。我於是再去晉謁當時也在長沙的陳果夫先生，他囑我回到政校任教。並且說，自我赴浙江，校中法律系雖現有專任教授四人，但系主任一職，迄尚在虛懸之中，囑我仍行回任。我說：我極願意回校繼續教書，但與朱驥先先生有約在先，必須先到武漢去和他見面，而後再往芷江，果夫先生當表同意。

我在長沙住了三天，也遇到了不少自江浙或京滬來的朋友。其中能偕妻率子的少，大多數都是原職已因地方淪陷而沒有了，孑然一身，先到後方再說。元月二十六日的晚上，我乘夜快車從長沙赴武昌。次日午刻，到達徐家棚車站。民國二十五年夏天，我曾到過一次武漢，所以對武漢比較熟悉。乃自己携了行李，乘渡輪過了長江，在江漢關碼頭上岸，雇了一輛人力車，到上次我住過的大中華飯店。才知道早已客滿，連問了幾家旅館也皆無隙地。我正在街頭來往徘徊，忽然想到京滬的朋友逃難到武漢的人，一定不少，何妨先去找到一兩位，再設法住宿的地方。於是立即想到葉溯中兄，他當時是正中書局的總經理，在漢口必有分店。乃關照人力車伕，拉到正中分店，溯中兄果然在店中。他看見我到，十分高興。立即說：他住在法租界鐵路飯店，房中有一張行軍牀，本來是一位熟朋友睡的，剛巧在這一天的上午，趁飛機去了香港，牀位空了出來，可以供

我暫住。這時候到處有空襲，而日本飛機不會去轟炸法租界，所以是人人求之不得的最安全地帶。溯中兄乃留我吃了午飯，一同到了鐵路飯店。

其時，朱驥先先生住在法租界的德明飯店，也是一個人。我去拜訪了他，並且說到在長沙遇見了陳果夫先生，仍要我回到政校去教書，朱先生也極表贊同。他並且說：「兄的志趣本在於教書，我拉了你出來幫忙，本想一同為桑梓盡力，有利於抗戰大業。不料只有八個月的時間，局面全非。使兄任怨受氣，至為不安。」我於是決定俟寒假結束，學校開學，就到芷江去，並計劃接妻兒也到後方來。

惟事有未能盡如人意者，就在我到武漢後的第三天，遷到芷江的中央政治學校，忽然發生了學潮。我當時也不知道其真相，只覺得政校而有風潮，不能不說是意外的奇聞。因之，朱驥先先生勸我在武漢暫時多住幾天，再定行止。其時農曆年關日近，雖則北平、天津、南京、上海、杭州，均已陷敵手，前方軍情緊急，而武漢老百姓仍然準備過年，市面熱鬧。這在我這剛從前線來的人，內心上頗多感觸。元月三十日，是農曆的除夕。朱驥先先生因為我是一個人，在漢口，特地約我到他所住的德明飯店樓下餐廳共飯，同座的人只有王文淵女士，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她。我們三人共吃了年夜飯，聽到滿街的砲竹聲。杭州淪陷，妻兒遠隔，這是我結婚以來，第一次未與她們在一起過年。飯畢，我先辭出，去看杜紀堂（佐周）兄，他將於次日飛往香港，轉赴上海租界，從事敵後教育工作，我托他帶去家信一封。而後

獨自走回鐵路飯店，葉溯中兄尚未回來。客館孤燈，一時鄉關之思，亂離之感，友朋之好，兒女之情，胸懷起伏，不辨何味。尤其想到內子常說的，我們戰前在南京費了六年辛苦所建立的屬於自己的小窠，從此沒有了。更有無窮的感喟，夜不成眠。

其時內子已率兩兒從溫州乘輪到了上海，係與沈士華兄同行。她們在張叙虛先生家中作客，自不便長久打擾。而我的行蹤未定，也不能來。上海有公共租界與法租界，敵人尚未敢進入租界，暫可苟安。內子的姑母一家，住在法租界霞飛路一八八六號，地近徐家匯。屋雖不大，總尚可勉強容留。而大元兒到上海後，出痧子，幸延醫服藥，較在內地為便，但乃母盡心調護，也極為辛勞。

當時從漢口到香港，有定期班機，因而可以寄航空快信。從香港到上海，則舟輪照常開行。即使如此，一信來回，也要半個多月。而武漢與上海租界之間，電報尚可以直達，長途電話則不能接。內子極關心我的住處，每有來信，總希望我能住在漢口的法租界，以免敵機轟炸的危險。但是漢口法租界的面積甚小，房屋不多，因以租金昂貴。我當時在失業之中，身邊所帶的現款有限，自不能不作節省的打算。即以鐵路飯店言，也必不能久住。一則葉溯中兄正在籌辦民意週刊，就要出版。他來往的朋友甚多，事務又繁。房間本來不大。放了兩張牀，空間更小。我夾在中間，對溯中兄公私皆不方便。二則鐵路飯店房金，每天要大洋六元，可謂極昂。溯中兄不肯要我負擔分文，心益不安。如他肯要我分擔，我也難

以久支。三則鐵路飯店有熱水汀，本可禦寒。但每到天明六時，就予關閉。也正是最需要溫暖的時候，忽然被冷如冰，極易感冒。

來到武漢的人，每日在增加。不但法租界內，早已到處客滿。即使在租界以外，也難有容身之地。適巧伍傲儼（傲）兄到鐵路飯店來拜訪葉瀚中兄，他們二人，是浙江省永嘉縣（溫州）的同鄉，一見面就講溫州話。傲儼兄是朱驩先生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任內的秘書長，因為省政府改組，而將職務交給新任的秘書長李立民，才獨自經過金華，到了武漢。他說，他在大智門車站前面的大智旅館，找到了一間房間。其地既不在租界之內，又距平漢鐵路車站極近，一般人認為空襲時不甚安全，所以能有空屋。他聽說我正在另行覓屋，便約我與他同住。我便立即贊同，隨他搬了進去。

到了大智旅館，看到房間果然寬大。每天房金大洋三元五角，但是只有一張大牀。傲儼兄說：「我們二人現在雖則均是單身漢，但兩個大男人同睡一牀，既不方便，也不舒服。幸而房中尚有一張長沙發，我比你大幾歲，我睡牀，你睡沙發。」我也欣然同意，並且聲明房金各半分擔，不因爲他睡牀我睡沙發而有分別，他也贊成。

朱驩先生到浙江任省政府主席之初，本請中央大學外文系主任樓光來兄任秘書長，樓對官場生活極不習慣，做了幾個月，堅決請辭，仍回中大任教，朱主席乃以傲儼兄繼任。傲儼兄原來是中大國文系的教授，也並無意於政治。但因他與朱先生是聯襟，不能不到省政府幫忙。傲儼兄

的國學基礎甚厚，所撰詩文均佳，但並不長於公牘。他心地至爲寬厚，對待朋友極好。他又健談，真是出口成章，言辭幽默。傳說他初到中大教課，他對學生說：「我雖是溫州人，但國語講得不錯」。第一堂課講畢，他問：「聽懂我講課的舉手」，只有一個學生舉手。他再問，才知道這位學生正是溫州人。可見他的鄉音未改，別人並不容易聽懂他的話。此時我們二人同住在一間房間，每餐同出去吃便飯，而又同在沒有工作的階段，所以日夜只是對談。聽了他的許多話，却也破除了我內心的許多寂寞與苦悶。

傲儼兄說到在浙江省政府委員會開會的時候，有一次忽然有了緊急空襲警報。敵機迅已竄入上空，他拿了公事皮包，拔腳就跑。朱主席安然坐在主席位子上，說是：「我並沒有走，你急什麼？」傲儼兄一面走，一面答道：「主席炸死，要由秘書長代理。如果連秘書長也炸死，省政府豈不是羣龍無首了？」幸而那一次敵機並未投彈，待警報解除，會議仍照常進行。

傲儼兄身材不高，又蓄有短鬚，外形有點像日本人。他在杭州交代之後，乘火車到了金華，曾在車站上被誤認爲敵人。一時軍警憲兵皆大爲緊張，而傲儼兄自己並不知道。加以他的溫州土話，別人又聽不懂，幾乎造成很大的誤會。幸而金華縣公安局局長張遠謀打電話向我報告，我說決不會有任何敵人，會這樣的大膽，獨自一個人，公開的坐了火車來。我再一想，可能是傲儼兄，我要張局長立即到金華車站，接到他到專員公署來。如果真的是敵人，我以區司令兼委員長行營軍

法官的身份，也有權審問。不久，張局長果然陪了來，也果然是傲儼兄。他說：「到了金華就想找你，但是你這個姓真難念，說了多少遍，竟沒有一個人懂。却只見幾位武裝同志在交頭接耳，不知忙些什麼。等到張局長來了，才弄清楚。」

我們在大智旅館同住了一星期，覺得負擔還是很重。傲儼兄說漢口生活高，不如搬到武昌去。他在武昌胡林翼路的基督教青年會找到一間宿舍，每月只要租金十二元。會中並有食堂，賣客飯，每餐只要小洋三角，有一菜一湯。門口有牛肉麵攤，一大碗牛肉麵，只要銅元三枚至五枚，確是比漢口便宜得多。我乃隨他過江，去武昌青年會參觀，係四合式的兩層木造樓房，中有一大天井。傲儼兄所找到的一間屋，在後面一排樓上的正中，室廣面南，陳設亦尚清潔。他說，他不能將我一個人留在大智旅館，先行搬走。要等我也找到了地方，他才遷入。我乃問侍者是否尚有其他空屋？侍者謂二樓東廊有一間，編號爲第三二二號，可望於日內騰空。惟室小面西，且廊前有大樹一株，日光爲之遮蓋，因以室內光線有欠充足。惟月租只大洋十元，水電費在內，我乃立即定下。二月十四日，傲儼兄與我，同時自大智旅館遷入。

(貳)

所謂武漢，是指武昌、漢口、漢陽三地而言，合稱武漢三鎮，是中國大陸本部的心臟。在地理上「東走江淮，西走梁漢，南達荆襄，北馳陳、蔡、泗、潁」，真是四通八達之區，也是兵家

必爭之地。三鎮的西面，有荆山、巫山，東面有大別山，東南有幕阜山，皆形勢險要，歷史上有關的各次戰役，知之者多，不必細說。即以近年而論，辛亥年的武昌起義，遂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。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，克復了武昌，就奠定了統一中國的基礎。

三鎮鼎足而立，武昌居長江之南，係湖北省的省會，為政治中心。漢口在長江之北，為商業中心。漢陽在長江之西，是工業中心。像這樣的分工合力，在我國別無其他地區，可以比擬。民國二十五年夏季，我第一次到武漢，只住了一個星期。曾於黃昏登武昌黃鶴樓，在蛇山上散步，謁張之洞所建的抱冰堂。黃鶴樓曾因崔灑題過詩，致使多少詩人為之擱筆。而我當時竟不自量力，寫了一首詩：

不盡江流動晚風，樓空鶴去地長雄。

蛇山蜿蜒龜山伏，都在揚鞭一指中。

龜山在漢陽，與武昌的蛇山隔岸相對，皆以象形取名。蛇山自江邊延伸入武昌市區，將武昌直剖為二。山腹於近年被開闢一大隧道，以利來往。當時湖北省政府主席是楊暢卿（永泰），有能名。而當地人格於迷信，以為蛇山穿腹，必招不詳。是年十月，楊果在漢口被刺身死。

武昌有東湖，浙江省紹興縣亦有東湖，峯削水深，有如桂林山水。我第一次到武漢時，曾往遊東湖。水面遼闊，碧波萬頃。夏季紅蓮遍野，平時可泛舟垂釣。我並曾寫了一首詩：

鄉思昨夜月如鉤，今日東湖泛棹遊。

遙念西湖應更好，又添歸夢到杭州。

東湖之旁為珞珈山，國立武漢大學建校於此。山巒起伏，桃李成陰。校門前有一大牌坊，上書校名，鄉人簡稱之為武大坊。狄君武（膺）兄嘗笑謂武二並無牌坊，而「武大」有之，當使武松氣死而潘金蓮更為得意了。

漢口無名勝風景，惟有一公園，中有孔雀。我這一次在漢口，曾往遊覽，孔雀突然開屏，美觀之至。漢陽有晴川閣，鸚鵡州，彌衡墓，伯牙臺，東西月湖，歸元寺，及桃花夫人廟。伯牙，息夫人，及彌衡，皆是歷史上突出的傳奇人物。我第一次在武漢一星期，第二次半年，竟均未到過漢陽。而自漢口到漢陽，只中隔一水，來往極便，真是一件最為遺憾的事。

我移寓武昌青年會後，空閒時多，即以讀書、寫作與散步，為日常的工作。再有的，就是逃警報。我因在逃難中，身邊沒有書籍，乃常到湖北省立圖書館去看書。館中的藏書不能算豐富，但去閱書的人尤少。在廣大的閱覽室中，常常坐不到十個人。庭前古木參天，也間有花草。我有許多篇稿件，就是在館內的閱覽室中寫成的。我並且在館中發見了全部的時代公論，那是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之役以後，我們一批年青的大學教授在南京創辦的。初由張曉峯（其昶）兄，後由楊公達兄任主編，而以我任主編的時間為最長。我們當時的宗旨，是內求統一，外謀抗戰。雖說是書生論政，而在統一與抗戰均已實現時，重閱舊文，內心真是充滿了喜悅。

葉溯中兄主編的民意週刊，在二月中出版。他約我寫稿，我幾乎每期均為他寫一篇，以評論

時事為主。週刊社地址在漢口貫忠里六號之甲，我有時從武昌過江到漢口去，便以其地為休息之所。陶希聖先生發起的藝文研究會也成立了，他於三月三十一日來信，約我為該會叢書，寫戰時法律常識及戰時地方行政兩種。由上海內遷至長沙南正路的商務印書館，也約我寫戰時法律常識，列為文史叢書之一。這三本書，我均未着手，就因奉命回浙，未曾動筆。但我却另寫了兩本中國戰時法規概述，而且是與中央政治學校畢業同學陳盛清君合寫的。他在校時成績優良，其時也來到了武昌，閒居無事。我將應得的稿費，送了一半給他。兩書各在七萬五千字左右，於夏季寫成，八月一日出版。當時距抗戰開始，方只一年，戰時的各種法令，尚欠完備。其中一冊是為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寫的，目的是為了供給各軍事學校的統一教材，以期提高員生的政治智識，澄清龐雜的理論，堅定其革命信念，以期適應戰時軍事學校政治教育的需要。另一冊是為青年書店寫的，目的在供給一般民衆的戰時法律常識。這兩本書，我早已無存，却於民國四十二年，在陽明山莊圖書館中發見了，真是高興。並且都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的再版本，在重慶印刷，用的是土報紙。前者每册定價大洋八角，後者九角。在抗戰發生之前，上海中華書局也曾約我寫過一本非常時期的法律智識。其時戰事未起，故用非常時期字樣，於民國二十五年底出版，此書却一直未曾再能覓得。

其時，上海商務印書館，因上海陷敵，一部份遷至長沙，一部份則遷至香港。該館出版的東

方雜誌於民前八年創刊，為國內歷史最悠久士林最推重的刊物。我在南京時，曾經常應約寫稿。現在香港繼續刊行，我乃就戰時地方行政組織等問題，撰稿寄去。我又將國際私法論一書，在武昌完稿。這本書尚係戰前我在南京時，於民國二十五年冬天所寫的。未及終篇，我到金華從政去了，遂擱置下來。這時我有時間整理舊稿，並予續寫完成。四月三十日，我寫好了序文。葉溯中兄思由正中書局出版，陳可忠兄擬由國立編譯館出版，我以正中尚在播遷之中，國立編譯館已遷至重慶，印刷條件不夠。故決定寄至長沙商務印書館，該館於民國二十七年七月為我出版。多年以來，戰亂頻仍，我早已未有此書，也曾遍覓未得。民國四十八年六月，我游新加坡，至當地的商務印書館訪其經理許寄南君，談及此書。許說其倉庫中尚有幾本，乃即以一冊檢贈。我真如晤見二十多年前的故人，至為欣喜。民國五十三年，王雲五先生辭去官職，重新主持商務的館務。擬於兩年之內，先行翻印該館的絕版書，以將本書影印，並增加資料，作為增訂版見商，自當欣然應命。乃於除夕之夜，寫了增訂版自序，次年二月出版，列為大學叢書。

武昌青年會距黃鶴樓甚近，我也常去登臨。並從蛇山下來，逛隧道兩端馬路上的地攤。其所售古董字畫，多係贗品。偶可發現舊書，索價不昂，但少善本。我曾買到一本薄薄的詞集，皆係小令，頗愛其句。惜書已佚去，原作者為誰，也告忘却。只記得其中兩闕：

是誰多事種芭蕉？風也蕭蕭，雨也蕭蕭。

是君心事太無聊！種了芭蕉，又怨芭蕉。
去年花底會相見，略帶釵枝，略染唇脂，略畫雙眉未入時。

今年花底重相見，瘦了腰肢，豐了圍姿，刪了些些覆額絲。

在戰時的後方，逃警報是隨時有的，也是必不可免的事。我住在武昌青年會，距蛇山的隧道甚近。每有空襲警報，即與路人一同飛奔進入。隧道可容千數百人，各不相識，患難與共。但入夏以後，天氣炎熱，汗流浹背。在隧道中避難者太多，人人皆感汗氣鬱蒸，呼吸不暢。却仍萬眾一心，苦而無怨。內子時在上海法租界，極為關心我的安全。每聞武漢有警報，非於第二日，看到報載的空襲情況的報導後，不能入眠。我於是在每次警報之後，必先到電報局發一電報去，報告平安，免其懸念。幸而敵機於四月二十九日，在武漢上空，為我空軍擊落了二十二架後，曾有一個月之久，未敢來襲。四月三十日上午十一時四十分，武漢才又有警報，至下午一時解除，敵機未得進入市空。並又為我空軍在郊外擊落十四架，人心大為振奮。

我在武漢最後一次逃警報，是在七月十五日上午十時，我奉召到湖北省政府去。十時半，忽然警報聲大作，急切無處可避。幸而警衛人員引我進入省政府的地下室，曲折寬闊，有電燈、電扇、電話等設備。居中的一室，已有四五人正襟而坐。行近視之，乃湖北三老中的嚴立三（重）、張難先，及湖北省政府秘書長柳劍霞（克述）兄。敵機只到黃石港上空盤旋，並未進入市區，警

報於十一時半解除。

(參)

朱驥先先生一直關心我的工作，他說：「儼與兄，均不宜長此閒居。現在陳辭修先生新任政治部部長，武漢衛戍總司令，不久還要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，必定需要人幫忙，未知兄亦與之相識否？」我說辭修先生雖係浙江省人，但他常年帶兵在外，我在南京時，未得有認識的機會。「朱先生說：「他日後將要當國家的大任，兄不可不識之。」朱先生乃代我們約定於二月十五日上午至其武昌平閣路家中拜訪，屆時並親自過江，陪我們同去。辭修先生禮賢下士，至表歡迎。見面之後，他滔滔不絕地說明他的大計，轉瞬已近午刻，又堅留朱先生與我們二人一同午飯。另有魏益三與毛邦初諸人，已候謁多時，因他與我們談得太久，尚未及見，他乃也約他們一同進餐。辭修先生一再表示不贊成黃季寬（紹紘）在浙江的作法，他說，遊擊戰只可以在敵後行之，如在我們政權所及地區，設了一百多位遊擊司令，那是「遊安全之區，擊無辜之民」，萬萬要不得。關於儼兄與我的事，因辭修先生一直在講話中，朱先生竟沒有機會開口。直至飯後告辭，朱先生才對他說，我們二人現在均無工作。他立即表示，聘我任政治部設計委員會委員，儼兄任武漢衛戍總司令部秘書，支中將俸。他並且笑着對儼兄說：「那是要穿軍服的。」我想到儼兄曾被人誤會為日本人，當場幾乎失笑。在歸途中，我對朱先生談起往事，並且說：不要武漢的

軍警憲同志，將他誤看為日本軍官才好，朱先生與椒儼兄皆大笑。

我於三月一日，到政治部主任事，地點在武昌曇華林。距我所住的青年會甚近，來去均可步行。設計委員會有一大辦公室，當時同事而現在在臺灣者，有柳克述、張宗良、張伯瑾、尹葆宇、陶滌亞諸兄。會中本擬分為法制、國際、民運等九組，在第一次全體委員會時，決定改分為五組。第一、二、三組，配合政治部的第一、二、三廳。第四組為國際研究及對敵工作，第五組為邊務與僑務。我初擬加入法制組，改分後，我加入第四組。辭修先生對政治部的工作，至為負責。對設計委員會，也屬望甚殷。每週舉行全體委員會一次，他必親自主持，對當前軍政問題，反覆剖析，不厭求詳。遇有特殊問題，則約一部份委員在會中或到其私邸商談，周諮博訪，務期至當。他常說：「應做的工作而無人做者，由本部（政治部）做；工作應由某機關或團體做而未做者，由本部發動他做；已做者，協助他做。」又說：「理論須前進，方案須切實際。須能真正領導當前的事實，方得謂之為前進的理論。」當時中國共產黨正在武漢大唱前進的高調，表面上服從國民政府，一同抗戰；事實上則係到處煽動，破壞團結。辭修先生的話，是有為而發的。我在政治部幾個月，曾奉指定審閱過若干種戰時方案，也曾奉指定起草過若干種重要文件，當時因均係密件，未曾留底，現均已無法再行查得了。

（肆）

我因常常寫作，為岳父錢逸塵公及捷成四弟在報章雜誌上，發見了我的姓名，於是取得了聯絡。逸塵公於民國二十六年二月，應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之聘，任文史教官，移家到南京居住。四月，我家自南京移回杭州，再遷到金華。他曾到金華遊過一次北山三洞，並留有題詩。及抗戰軍興，南京告急，他乃隨同學校，由南京遷至九江，再由九江遷至武漢，住在武昌雙柏廟前街一號。我在金華，再由金華到武漢，戰時音信梗阻，彼此失去聯絡。其時中央軍校第十四期的學生，正由水陸兩路向四川成都集中。第十五期正待入伍，所以他暫時留在武漢待命。他向武漢日報採得了我的地址，立即見了面，真是驚喜交集。

至於捷成四弟，本來在江蘇省興化縣求學。於民國二十五年夏季到南京，進入南京中學二部，讀了一學期。冬季，因先祖母病危，隨我返興化侍疾。二十六年春季，隨四叔蘭叔公至北平，入志成中學續學。七七以後，平津淪陷，他自北平冒險轉青島濟南而到了南京，被收容在平津流亡學生訓練班，班址就是紅紙廊中央政治學校。南京危急，再從首都經蕪湖、祁門、景德而到了湖南省的衡陽縣，最近才算是畢業，分發在陸軍第五十四師工作。師長適為冷蓉庵（欣）兄，與我家有世交，也是我的好友。師部接收後，還要再加訓練。却在報紙上看到民意週刊的廣告，有我寫的文章。乃輾轉向週刊社探聽到我的住址，因而兩昆仲得以重逢。我建議他投考中央軍校，即由我岳父率其入川，後考入第十六期，於兩年後畢業，參加抗日的戰役。

四月五日，是清明節。先人塋墓均在陷區，無法祭掃。而岳丈却定於是晚上中央軍校的輪船，離開武漢，上駛四川，捷弟同行。晚間，我們在武昌冠生園一同便飯。飯後，我送他們到江邊的碼頭。戰事如何變化，不得而知。因此他們此去，也不知何時再能晤面。岳丈知道我熱愛西湖，鄉思極濃，乃在席間，寫了八闕望江南詞。

西湖憶，最憶是清游。花色春嬌山色秀，波光秋弄月光柔。到處敞紅樓。

西湖憶，最憶是湖橋。十里笙歌天不夜，四圍山黛畫難描。勝地忍輕拋。

西湖憶，最憶是斜陽。西子慵裝黛鏡晚，南屏歸艇櫓歌忙。塔影失錢塘。

西湖憶，最憶是山家。古洞烟霞環曲澗，名泉澗雨試新茶。腸斷訴胡笳。

西湖憶，最憶是孤山。處士梅花零落盡，忠臣華表寂寥間。何日鶴飛還？

西湖憶，最憶是雙峯。古壘叢祠孤憤在，新碑臺塔白雲封。回首月明中。

西湖憶，最憶是先塋。故壟松楸留尺土，天涯風雨已清明。麥飯阻戎兵。

西湖憶，最憶是吾廬。門外柳垂湖上艇，樓邊月照閣中書。都付與倭奴。

也就在四月上旬，陳果夫先生到了漢口，住在大中華飯店，約我於十日上午前往面談。我去，他已外出。午後，他派專人送一封信來，說：「到武漢，不知紀念週改在星期日舉行，以致失迎，他要過江來看我。我以他素來多病，怎可由他勞步，乃立即過江去看他。他說：「中央政校

的風潮已經平息，為首學生開除七人，自請退學者有一百餘人，批准了七十餘人。教務主任劉鐸山（振東）君，調任研究部主任，而以周致琛（炳琳）接替。總務主任吳挹峯先生也調職。兄之聘書，已由新任周主任寄來，今即面交。現學校正由芷江向重慶遷移，兄可待學校遷定後，直接入川授課，薪津可自本學期起支。「我當表感謝，並將聘書收下。但薪津則表示不能支領。以既未上課，自不可先支待遇。果夫先生問我現在如何維持生活，我謂政治部每月有車馬費大洋壹佰元，另外從事寫作，也有稿費收入。我住在青年會宿舍，費用甚省，每月有大洋三十元，已可足用，餘款尚可接濟家人。果夫先生聞言，遂不再相強。」

四月二十五日，忽接周佛海來信，約於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時，到武昌胭脂坪九號侍從室第二處面談。我與周只於抗戰前在南京見過二三次，並無深交。見面之後，才知道中央黨部改組，朱驥先先生任秘書長。顧孟餘先生任宣傳部部長，周為副部長。另一副部長為董顯光先生，並兼國際宣傳處處長，副處長為曾虛白兄。顧因病滯留在香港，一時不能來，由周暫代部務，約我到部中任秘書。其時中央黨部已自南京遷往重慶，但尚有一部份在武漢，以湖北省黨部為辦公地點。另以漢口原日租界的河街四號為辦事處。該地係日僑在漢口的銀行公會，建築陳設，均極華美。朱先生接任中央秘書長後，派周友端兄任秘書處處長，整修湖北省黨部房屋，費去大洋一萬元。周佛海與我，於四月三十日到部。周認為中英文報

紙與各國記者均在漢口，因以宣傳工作的中心，應該設在漢口。國際宣傳處原已在漢口怡和街十一號辦公，宣傳部乃另賃漢口欽天村二號為部址。

宣傳部在南京時，編制龐大，人員原有二百四十餘人。此次改組後經核定留一百人，並先派八十人於六月十五日晚間乘輪入川，另留二十人在漢口辦公，日後隨同軍事機關進退。我在宣傳部既為專任，有固定的待遇，乃向陳辭修先生面辭政治部設計委員會的委員。辭修先生說：「宣傳工作與政治部的工作頗多關連，兄可在雙方擔任聯繫，不必辭職。」我乃謂保留名義，照常出席會議，但不再支領車馬費，他也同意。此後政治部與中央宣傳部經常共同招待武漢的新聞界人士，地點為以往的日租界中街六十七號。在日僑未撤退前，原為日本酒館，旅館兼妓館的「安樂家」，現改為新生宿舍。陳設仍全為日式，備有中餐西餐。中餐每席不超過大洋十二元，西餐每份不超過大洋一元二角。可供煙酒，較勵志社為寬，但另行計費。至小賬及車伏侍從飯費，概予免除。此在當時的漢口，是比較節約的所在。

我在中央宣傳部所擔任的工作，甚多甚雜。其中以代表本部，每週參加兩次固定性的會議，最有意義：

一是由本部國際宣傳處主持的中外記者招待會，於每星期一下午三時舉行。由徐培根兄到場說明前方戰況。他口齒清晰，態度和藹。而於全國各戰場的敵我形勢，瞭如指掌，分析詳明，頗得好感。記者招待會散後，則於下午四時半起，

由陳辭修先生約集各報重要人員談話，並通知外交部政務次長徐叔謨（謨）兄，出席說明每一週的國際情勢與外交情況。叔謨兄學養素豐，又擅於詞令，也為與會者所滿意。

一是由陳辭修先生召集的宣傳會報，每星期五中午，在他的武昌平閣路家中舉行，他並備便餐招待。他素來健談，每次自上午談到午後。他雖則常常自謙地的說：「口不擇言，辭不達意。」其實，他每次所說，均富有內容。使在座者增加了許多見聞，為外界所不易獲得者。有時候，也有若干有趣的對話。茲舉一例：某日，白健生（崇禧）先生從前方歸來，談及某日漢口某報，載有一女郎徵求伴侶的廣告，除標明若干條件外，特註明武人軍官不必嘗試。現在前方將士為國拚命，竟不能得徵侶女郎的青睞。應通知報館，此後對廣告內容措詞，加以注意。辭修先生笑謂：「健生先生讀報真精細。」白謂：「前方難得看見報紙，偶得一頁，如獲至寶，莫不仔行看到底。」

每次會談之後，常常要寫宣傳通報或宣傳計劃，我就常常被指定為執筆人，或起草人之一。在七七抗戰週年將屆之前，我奉命草擬以七七節定為抗戰建國紀念日的辦法。其中有一項，是規定各地建抗日紀念碑。提到中央後，汪精衛反對用抗日二字。他說：任何戰爭，均有了時，不必將敵國國名，永久刻在碑上，遂改為抗戰紀念碑。而汪氏果於是多，離開了抗日立場，而到淪陷區，成立偽組織。

其時，中央各宣傳單位負責人，常於晚間集

合在漢口法租界的萬國旅社，交換消息，商量發布新聞與撰寫社論各事。蕭同茲、陳博生、劉百閱諸兄與我，皆是常客。每次均談得很暢快，於午夜才盡歡而散。

武漢的氣候，完全是屬於大陸性，冬冷夏熱。三月八日是婦女節，在江南正是草長鶯飛的初春佳日，而武昌忽然大雪，冷得出奇。四月以後，天時漸熱。我所住的青年會宿舍如斗大，而又面西，既潮濕，又鬱悶。適王平陵兄在張之洞路租到了一棟民房，係新建的所謂洋式房屋，將樓上的一間分給我住。但宣傳部的工作重心在漢口，一水之隔，來往要趕渡輪，也頗費時間，乃再遷至漢口黃陂路八十八號樓下。黃陂路適在法租界的旁邊，遇有空襲警報，隨時可以進入租界。每月房金要大洋八十元，我與許孝炎兄合住，各半分擔。前房本係客廳，有一吊扇，由他住。我住後房，原係飯廳。房東是白俄老婦，雇用一湖北籍青年小張，為司雜役。房東不許房客舉炊，因以我們只得在外面自行就食。到了六七月間，氣溫日高，每天入浴三次，仍不能却暑。晚間，有時到沿江的邦可花園或明星球場小坐。有冷飲，也有小型的室外高爾夫球場。有時則坐上長江的渡輪，任其在武昌漢陽門與漢口江漢關兩個碼頭中來去，可以享受江上的清風。只要不上岸，無須再買船票。偶爾渡船正在江心，有了空襲警報，則向下游行駛，避入江邊的叢樹或蘆葦中，則更為涼爽。夜間返寓，熱浪不退，總是勉強入眠。次晨醒來，涼席上留有人影，乃是一夜之中所流的汗漬造成的。

(伍)

六月下旬，國民參政會將要成立。二十八日，我忽奉派為該會的特務秘書。同時奉派的，有端木愷、李迪俊、張廷休諸兄。我究竟是由何人推介，到現在事隔數十年，仍不知道。議長為汪精衛，我只於抗戰前在南京見過一次，那是交通部在中山路的新建大廈落成，我去道賀，適汪亦在場。朱驥先先生時任交通部部長，為我介紹，彼此寒暄了幾句。副議長為張伯苓先生，他一向在北方辦學，我從未見過。因以汪張二人，不會提到我。秘書長為王雪艇（世杰）先生，副秘書長為彭浩徐（學沛）君，我也問過他們兩位，他們都說並未為我提名。

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名額，原定為一百五十人。因不足網羅時賢，乃於審議名單時，臨時修改組織條例，增為二百人。在其間沒有任何人來與我談過參政員提名的事。浙江省的參政員，由浙省黨政雙方向中央推薦，我既已離開了浙江，也不會有人想到我。待全體參政員名單於六月十六日公布之後，有人對我說，在浙江省學術類參考名單中，曾將我名列入，但我事先並未知之。

六月三十日午刻，國民參政會正副議長，在漢口商業銀行宴請秘書處重要工作人員，這是我第二次見到汪精衛。汪見面就問我是否尚在辦刊物？因為我們當年所辦的時代公論，對汪的不抵抗政策，攻擊得很利害，可能他內心頗以為憾。前一天清晨，中國青年黨提名的女參政員喻維華，四川省人，在漢口黃陂路七十九號寓所被刺，

身中三槍，當場身死，兇手在逃。喻原名德權，是我在吳淞中國公學大學部就學時的同學，比我低一年。因之，席間就以此事作為話題，武漢警備機關向各報聲明，本案並無政治關係。

國民參政會秘書處，在漢口福照街十九號辦公。為免得外人指摘在法租界，對外乃謂在怡和街三號。大會會場，則在兩儀街上海大戲院。怡和街與兩儀街原來均屬於英租界，但英租界已於民國十五年，由國民政府收回。七月一日，議長指定我為議事組副主任，並兼辦聯絡等事。在全體參政員中，曾在民國初年任老國會議員者，佔十分之一，年齡均已超過六十歲，彼此有十餘年未見者。蓋自民國十三年以後，我國即無民意機關，也可以說，中央民意機關，已經中斷了十四年。

國民參政會於七月六日上午九時開幕，至十五日休會。關於開會的經過，在旅臺參政員所編印的國民參政會實錄中，有翔實的記載。王雲五先生所著的岫廬八十自述中，也有述及。各參政員對行政院施政報告的詢問，以關於財政者為多，其次為外交。如王雲五先生詢問：「傾軋報告，抗戰一年以來，支出十五萬萬元，收入只一萬萬八千萬元？差額如何彌補？此後長期抗戰，在財政上有何準備？」雲五先生每次發言，皆聲音宏亮，措詞得體，頗受與會人員的重視。又，各參政員對議事程序問題，亦頗注意。如褚慧僧（輔成）先生問：「審查會中的少數意見，可否一併向大會報告？」又有人問：「何類議案須先付審查，何類可逕付大會討論？」汪議長均有解釋

，此將成爲我國日後議會政治的不成文法。

中國國家社會黨創始人張君勳(嘉森)先生，是國民參政會中各方所矚目的人物。該黨在參政會中共得九席，其中一人爲陸鼎揆先生。傳說汪議長初不知陸爲何許人，以之問張。張謂：「陸某之於我，猶甘乃光之於君也。」陸曾在吳淞中國公學大學部任教，爲我的業師之一。君勳先生於民國初年，任浙江省交涉員，在杭州馬市街辦公，常來看我父親，故我幼時即已拜見過他。參政會開幕前，君勳先生在汪張二人舉行之歡迎茶會中，起詢：「參政會組織條例第五條規定：在抗戰期間，政府對外對內之重要施政方針，於實施前，應提交國民參政會決議。前項決議案，經國防最高會議通過後，依其性質，交主管機關制定法律或命令行之。現在政府除施政報告外，有無準備內外方針之議案？在法律或命令之前，是否應明准國民參政會決議？在國防最高會議未通過前，國民參政會決議案，是否不能公布？」汪議長謂：「俟報告國防最高會議決定後，再行答覆。」此後究竟如何答覆，因我於七月底即已辭去參政會秘書職務，不得而知了。

國家社會黨另一參政員，爲羅君任(文幹)先生。他於民國三年擔任北京高等檢察廳檢察長，對袁世凱御用的籌安會，倡言帝制，提出檢舉。在舉國風靡無敢非難的環境中，而有此膽識，因以直聲著海內。其後任財政總長，竟爲北洋軍閥政府誣陷，羈獄一年有半。幸得余樾園(紹宋)先生奔走營救，及劉崧生(崇佑)律師任義務辯護人，方得免罪出獄。他在獄中寫了一本獄中

人語，於民國十三年由北京民國大學出版，論當時的國是。雷渭南(殷)先生爲之作序，謂爲：「奇傑警策，切中時弊。」我讀其書後即久爲心儀，迄未得謀面。六月三十日同席晚飯，適與鄰座。我乃向其提及獄中人語，並略述大要。羅先生至以爲奇，謂想不到此書得兄賞識，並謂：「當時在獄中，不許接見，亦不許有人饋贈，只雷渭南君因係國會議員，可來監內見訪，並以香煙見贈。遂將所著筆記，陸續交其帶出。其後吸煙須於如廁時祕爲之，紙筆亦被搜檢，故未得終篇，出獄後始行補成。」

在參政會開會期間，我與劉百閱兄鬧了一次大笑話。百閱兄是參政員，坐在議場中。我兼司會場紀錄，坐在主席台上，在主席之右側。因爲開會的時間太長，許多報告毫無內容，參政員與參政員之間，乃以互送紙條爲消遣。內容多爲笑謔之語，或者是打油詩。如「相逢握手喜洋洋，躑躅踰踰影戲場。」「天下人才盡於此，囊中妙計看何方？」「只要會場不打架，已經爲國大幫忙」等，均是當時傳誦的名句。這些紙條，有時也送到主席台上給我看，大家看了就付之一笑。百閱兄爲人不拘小節，友朋中常呼他爲「呼圖克圖」，這本是蒙古活佛的尊稱，他也不以爲忤。其時許多人均係隻身在武漢，眷屬有的尙留在前線或是陷區，有的則已先遷到大後方，惟百閱的夫人在漢口。百閱夫婦均頗爲好客，真是賓至如歸，我們就常到他們家中去打擾。百閱兄常戲呼他的太太爲「糊塗之人」，於是百閱兄的呼圖克圖尊號，幾乎人人皆知。某日，百閱兄送一紙條

給我，我就另寫一紙條，命會場幹事送給他，上面寫着某某呼圖克圖已由蒙古到了漢口，爲參加全民抗戰，特來向中央請訓。百閱兄看了，就放在桌子上。另一參政員王亞明兄適坐於其旁，看到了便信以爲真，將紙條取走。王當時正擔任武漢日報社社長，以爲是獨得的新聞，便在第二天報上，刊登了出來。我於次晨起床，看到報紙，又驚奇，又好笑。待到了會場，已經有許多人引爲笑談。但是既無從更正，也難以解釋。幸而蒙藏委員會未來追問，就不了了之。

(陸)

我在武漢已有半年，正準備於暑假中，將軍事委員會政治部，中央宣傳部及國民參政會的工作皆作一結束，以便入川，到政校授課。並已托友人在重慶青年會爲我租得了一間宿舍，又向航空公司買妥了飛機票，可以在八月底以前，隨時劃定座位起飛。我又另定妥了八月三日入川的船票，以船行可以一賞三峽的風景。忽然，周企虞(象賢)兄於七月十九日下午五時來黃陂路見訪，謂：「浙江省政府黃主席季寬(紹竑)來武漢養病，住在武昌珞珈山療養院，有事奉商。但他現既稱病住院，自不便出外拜客，兄可否於明晨往一訪之。」第二日上午十時，我渡江到漢陽門碼頭，黃已派汽車候接，我乃乘往病院，見黃並無病容。我自一月間離浙以後，未曾與之通過音訊，更未再見過面。我素知黃對人傲慢，但因企虞兄來言，不得不一訪之，故不思多談。而黃見面之後，却頗爲禮遇，一反其平時態度，大使我

感到意外。

黃首先謂浙省敵人自佔領杭嘉湖十四縣後，未再前進，浙東已告偏安。金華市面繁榮，人心安定。旋謂浙省黨政之間常有歧見，並列舉數事，以為證明。又謂：中央對浙省情形欠了解，遇事掣肘，頗感難以展布。此次來武漢請辭，未奉照准。但奉指示，省府須局部改組，原任民政廳廳長王逸龍（先強）必須更動。擬請兄繼其任，一同返浙。最好能於數日內，同車東去。

關於浙江省政府將有改組的消息，在七月初，武漢就已盛傳。我以不在其位，並未多予注意。只是三月二十九日，中央舉行臨時全國代表大會，以第五次代表大會的代表為出席代表。浙江省的許多朋友，因而到了武漢。他們說起黃季寬已將所委的一大批遊擊司令取消，而將民間武力，擴編為浙江省抗日自衛隊，省有幾個直屬支隊，大縣有大隊，小縣有中隊。他自己兼任總司令，省保安處處長宣鐵吾兼任副司令，張紹棠（諱文）任參謀長。並在各縣田賦項下，帶征抗日自衛捐，以為經費。現在黃季寬忽然要約我一同回浙，我因事先毫不知情，自未曾準備應如何答復。但我既明知黃不是可與共事之人，尤其元月間，我方辭職離浙。時只半年，又怎可貿然回去？我乃謂素志在於任教，從政並非我性之相宜。如此重責，更難勝任。茲早已接受了中央政治學校的聘書，正在擬攜入川。黃謂：「我係奉命訪賢的聘書，正在擬攜入川。黃謂：「我係奉命訪賢的聘書，正在擬攜入川。黃謂：「我係奉命訪賢的聘書，正在擬攜入川。」

未見有處分。武漢滿街皆有左傾言論書報公開出售，亦未聞閱者有罪。以此兩事責王逸龍，並非「至平」。我聽他的話，對王尚有偏袒，我更不能應命，仍再三辭謝。時已午刻，先行告辭。

午間返至漢口，即往訪朱驥先先生。下午，又訪陳辭修先生與陳布雷先生，又致電重慶陳果夫先生，具述黃季寬之言，並請代我辭謝。各人皆謂事先並不知之，亦並未為我推介。晚，接果夫先生覆電，所言亦同。直至民國三十一年秋季，童遜瓊先生忽然在福建省南平縣的地攤上，發見一張字條，另有林蔚文為送達這張字條寫給黃季寬的一封信。童先生、寧波人，曾於我在中國公學大學部求學時，講授經濟地理，其時在福建省貿易公司任職。他當時以白米五石的代價，將字條及信買了來，寄給我作為紀念。童先生問地攤老板，是從什麼地方得到的。老板說是有一個從浙江來的老婦，提了一隻箱子賣給他，其中有這兩件。我看到之後，才知道黃季寬當時對我所說「奉命」兩個字的由來。至於何以會到了福建，我推測是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十七日，敵人進攻金華，黃季寬在羅店的住宅被炸，黃的秘書潘君當場被炸死。潘的家人即循浙贛鐵路到了江山，再由江山進入福建。而地攤老板所說的老婦，可能是潘宅的佣人。

七月二十三日下午，黃季寬連來黃陂路訪我三次。前兩次我均外出，未得遇見。到下午五時，他第三次來，方才遇到。他仍堅持前請，並謂絕對授我以人事全權，我只得答以容加考慮。晚間，許多位好友齊集在中央飯店四號，商談我事

，竟一致勸我接受。我雖訴說我志在教書，不在從政。且已收下中央政校的聘書，以及日後與黃共事，不知如何適應等種種困難，他們皆認為不成問題。他們一致認為黃向來色厲內荏，經過此次的改組，必定會對黃尊重。而且九江方告失守，武漢局勢日急，浙江省突出在東南戰區的前方。我是浙江人，理當歸為桑梓効力，為中央分憂。至於到重慶去的人多的是，少我一人，無關大局。談到午夜，我是孤掌難鳴，得不到眾人的同情。也有人說：不妨先去做一年，如果環境確屬不好，會負責再將我調回到中央來。我說：如果為大義所迫，不得不去，那就不顧環境的好否，我一定要做到抗戰勝利，方行辭職，以貫徹我為抗戰到底犧牲自己的決心。

越日，陳布雷先生約談，交給我一本與侍從室直接通電的密電碼，並勉我為中央與黃季寬之間，做好橋樑工作。我說：「我如決定回浙，也就決定不需要用這本密電碼」。布雷先生微笑地說道：「兄言甚是」。我的本意，是在浙江省境內拍發電報，黃季寬必有辦法知道。我不經過省政府而直接上聞，黃季寬也必定不高興。這樣一來，我的橋樑也就做不成了。我並未明白說出我的想法，而布雷先生却已經了解了我的想法。其通達與精細，均屬不可及者。但是他還是命我將密電碼帶走，此後每年還換發一次。而我在浙江省政府十年，却一次也未用過。

在這樣情形之下，又如上年四月，我從南京到金華時候的一樣，已無自行選擇的餘地。我於是仍請周企虞（象賢）兄去答復黃季寬，決定應

約返浙，但不能與他同行。因為我在武漢，尚有許多事要辦結束，但必在七月底回到金華。周其時仍是浙江省政府的委員，聽說我答應回浙，大為高興。

我就在幾天之中，將在武漢的所有職務，全部辭去。將一應經手的事件，交代清楚。將中央政校的聘書，退寄給學校，並將入川的船票退掉。至於預購的飛機票，因鄭亦同（吳）兄甫從外地來，要到四川去，就送了給他。又到許多處辭行，朋友中多有要為我餞行的，時間不多，就請他們聯合作東或改為茶叙。人人都在準備西行入川，而我却獨自東行。

七月二十五日的晚間八時二十五分，乘粵漢鐵路火車赴長沙，余井塘葉溯中許孝炎三君送我到漢口的江邊。我提了半年前從金華帶來的行李，上了火車。沿途思慮紛繁，人生的遭遇，真是難以預測。惟有一事差可自慰者，即母親於兩個月前從興化到了上海，內子自不便迎其借住在姑母家中，乃另分租他人的餘屋兩間，待姑教子，又日夜繫念遠人。我自獲得工作之後，每月寄款赴申。因滙兌不通，常托吳開先兄，由其在滬的地下工作人員，代為劃寄。後來據內子說，常由一位老者，送款前往，每次為數不多，老者深佩我家生活的刻苦。我回浙之後，因上海與寧波及溫州航輪尚可通行，當可接妻兒來聚。在戰亂流離之中，家人又可得團圓，也是幸事。

我在長沙住了兩天，與胡次威、羅佩秋（時實）、王鳳階、鄭亦同（吳）諸兄，在亂離中匆匆晤聚。長沙市區迭遭轟炸，市面大衰。與半年

前經過時相較，不勝感慨。二十八日的早晨，由胡次威兄設法，為我買到江南汽車公司去南昌的長途汽車車票，下午六時抵達。車站附近的蕭條情況，尤過於長沙。我上次經過南昌，火車停了一夜，未曾下車。此次本想住一晚，看看在江西省政府服務的朋友，並一遊名勝。而下午八時，浙贛路有車從南昌開往金華，乃即購票登車。心想南昌距浙江甚近，暢遊可俟諸異日。誰知竟從此未得再往，以致兩次均是過門未入，失去了一瞻名城的機會。

車行一晝夜，沿途未遭遇到空襲警報，於二十九日晚間到了金華。半載重來，車站上全是講杭州話的人。腳伏，小販，及站外的人力車夫，皆是從杭州撤退出來的難民。因我事先並未通知任何人，也就沒有任何人知道我回來。我雇了一輛人力車，直接進入城內，投宿在新開的西冷飯店。飯店的賬房與茶房，也都是杭州人。他們當然不是從西湖的西冷飯店來的，只是借用這個店名而已。我又獨自走上街頭，吃了一碗麵，那是杭州的做法，稱為「片兒川」。而後去我家的舊居柴場巷，看胡健中兄。他看到了我，說：「阮郎果歸矣！」因與縱談浙局，竟至夜半。我請他在次日的東南日報上，刊載我已到金的消息，免得有人打聽行期，或是到車站歡迎。後來，從漢口轉來了不少封歡迎我回浙或探詢我行程的函電。徐朝陽兄告訴我，他們曾接連幾次到金華火車站去等我，均未等到。他們以為我一定會帶了很多一人一同來接事，決沒有想到我是一個人自己提了行李下火車的。

次日，胡健中兄來看我，並將新填的一闕阮郎歸詞見贈：

臨岐記譜浣溪沙，烽煙一歲差。重逢依舊是金華，渡江願尚餘。吳越地，最堪嗟，沉淪百萬家。西湖人更隔天涯，與君肩擔加。

後為鄭烈蓀（文禮）兄所見，也寫了一闕。

上年我離金華時，健中兄譜浣溪沙見贈，鄭亦曾有和作。故此他寫的，也是調寄阮郎歸：

記君解組上征鞍，長亭柳未黃。而今衣錦又還鄉，荷風拂露涼。塗粉墨，又登場。風流羨阮郎。十年閱盡幾滄桑，笑余迎送忙。

民國三十年十一月，我第一次到重慶。返浙之日，盧冀野（前）兄，也譜阮郎歸送別：

分襟漢上忽三年，重逢字水邊。相看一笑更無言，花開總可憐。雲影淡，月還圓，方巖別有天。歸時飛夢落西偏，今宵尊酒前。

民國三十三年五月，我第二次到重慶，曾訪朱經農先生，不遇。因敵人將進犯浙南，即匆匆返浙。朱先生也填了兩闕阮郎歸見寄：

七年烽火滿江關，羈遲戎馬間。山河跋涉不辭難，來時花已殘。留未久，又飛還。雲天萬里寬。相思相望見無緣，詩成一寄箋。

記會戰後訪衡山（長沙二次會戰後，南嶽會議，毅成與我均到），風雲指顧間。新詩共詠意拳拳，楓林萬樹丹。思往事，倍纏綿。滄桑幾變遷。洞庭依舊見狼煙，驅倭落照邊。

民國六十一年三月十九日，下午八時二十分寫畢。時在臺北。